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贾忠贤

营销编辑：雷静宜

封面设计：储平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20mm×1280mm 1/32

印张：17.5 字数：400,000 插页：2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88.00元

ISBN：978-7-208-15354-7 / B·1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往行为理论. 第1卷 /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354-7

I. ①交… II. ①尤… ②曹… III. ①《交往行为理
论》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3085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献给乌特·哈贝马斯-韦塞尔赫夫特
(Für Ute Habermas-Wesselhoeft)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第一版序言 7

第三版序言 13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17

概论：社会学中的合理性概念 17

1. “合理性”：概念的临时定义 24
2. 神话世界观和现代世界观的若干特征 65
3. 四种社会学行为概念中行为与世界的关联以及
合理性层面 102
4. 社会科学中的意义理解问题 133

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195

概论：科学史语境 195

1. 西方理性主义 209

2. 宗教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解神秘化与现代意识
结构的形成 241

3. 作为社会合理化的现代化：新教伦理的作用 275

4. 法的合理化与对当代的诊断 304

三、第一卷的中间考察：社会行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 346

概论：分析的意义理论和行为理论的前言 346

四、从卢卡奇到阿多诺：作为物化的合理化 425

导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对行为系统的不断复杂化 425

1.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马克斯·韦伯 430

2. 工具理性批判 455

参考文献 502

译者前言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的一部重要的代表著作，但不是他的集大成著作，因为按照哈贝马斯自己在前言中的交代，这部著作不过是他对自己前期思想的总结，是他从规范的角度重构社会批判理论的绪论，因而不是一部结论性的著作，而是一部过渡性的著作。关于这部著作的思路、内容、历史效果以及有关重要概念的中译等问题，译者将在第二卷的后面撰写长文加以探讨。但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首先简单地解释一下：

（1）译本问题：我们知道，若干年前，国内就已经有了《交往行为理论》的中译本（请参阅：《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问世，现在再来重新翻译出版这部著作，这样做是否有必要呢？关于现有译本的质量问题，译者曾经撰写专文予以点评，刊载在《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杂志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撇开翻译质量问题不谈，我们认为，像《交往行为理论》这样重要的社会理论著作，有两个乃至多个汉语译本，应当不是一件坏事。毕竟，翻译是

一门理解的艺术，不同的译者，不同的时代，对原著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2）结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阅读和理解，哈贝马斯在出版《交往行为理论》（第一、二卷）之后不久，就把他围绕这部著作先后撰写的相关文章编辑成导读式的专著，题为《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同样，为了便于汉语学界接受《交往行为理论》，也为了给有关研究者提供完整的研究文献，我们在征得原作者和原出版社同意的前提下，把《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这本导读著作和原著放到一起，作为《补充论证卷》，一同予以翻译出版。

（3）书名问题：许多友人都曾向我提出，认为这本书的标题翻译为“沟通行为理论”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个人认为，把“Kommunikation”一词翻译成汉语的“交往”和“沟通”，只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这里之所以坚持选用“交往”，主要是想强调哈贝马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强调这本书中所理解的“Kommunikation”概念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出的“Kommunikation”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译本出版之际，请允许我首先向哈贝马斯教授（Prof. Dr. Jürgen Habermas）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他在诸多方面对我的大力帮助。在我留学德国、阅读和研究哈贝马斯著作期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弗里德堡教授（Prof. Dr. Ludwig von Friedeburg）、霍耐特教授（Prof. Dr. Axel Honneth），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尼森博士（Dr. Peter Niesen），以及波茨坦大学哲学系的克吕格尔教授（Prof. Dr. Hans-Peter Kruger）等，均给我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学理上的指点和技术上的帮助。国内诸多师友，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比较

文学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诸位师友，长期以来一直关心和帮助我对哈贝马斯的翻译和研究，但愿这个译本不会让他们过于失望。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俞吾金教授和陈学明教授给我提供了驻所研究的机会，让我得以从纷乱嘈杂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把译稿系统地整理和校对了一遍。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版权部的哈特博士（Frau Dr. Hardt）在哈贝马斯著作版权方面给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并且馈赠了大量相关的经典文献和研究著作，让我得以轻松地研读和翻译哈贝马斯的著作。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的格斯先生（Herr Berthold Gees）以他对哈贝马斯的高度热情和精确理解，不断鼓励和帮助我，并解决了我在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生活难题。

曹卫东

2000年春节初稿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2003年春节定稿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

第一版序言

十多年前，我在《社会科学的逻辑》(*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一书的前言里提出要建立一种交往行为理论。¹当时，我把方法论兴趣和“社会科学的语言理论基础”联系在了一起，而今，这种方法论兴趣已经变成了一种实际关怀。交往行为理论不是什么元理论(Metatheorie)，而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我不认为对理解行为的普遍结构的分析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手段，在步认识论的后尘。因此，帕森斯(T. Parsons)1937年在《社会行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所阐述的集理论重建和概念分析于一体的行为理论，无疑是我的一个榜样；但其方法论趋向同时又让我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基本概念的结构和对实际问题的回答之间密不可分，这是典型的黑格尔作风。

1971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了克里斯蒂安·高斯讲座(Christian-Gauss-Lectures)。当时，我打算对讲稿稍作整理就予以发表，这样想看来是错误的。我对行为理论、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

以及分析哲学的相关领域钻研得越深，就越感觉到除了细枝末节之外，整个研究的目的还不是很清楚。我越是想满足哲学家的解释要求，就越是偏离社会学家的关怀，因为社会学所要追问的是概念分析究竟有何意义。我难以把我所要表达的一切放到恰当的表述层面上。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即已认识到，表述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它同样也是实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A·麦卡锡（Thomas A. McCarthy）的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新的著作。

在过去四年里，除了由于到美国作客座研究而中断一个学期之外，我一直都在撰写这本书。在第一卷的中间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当中，我对交往行为这一基本概念作了阐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三个相关的主题：首先是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视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的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代发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

导言部分所论述的主题是：合理性问题并不是外在强加给社会学的。对于任何一种提出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而言，（一直具有丰富规范内涵的）合理性概念的使用问题都必须落实到三个层面上。（使用合理性概念，）既无法避免其主导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的元理论问题，也不能回避通过理解意义而进入客观领域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的方法论问题，最后还有经验理论问题——从何种意义上讲社会现代

化堪称是合理化——也是绕不过去的。

通过对理论历史的综合研究，我找到了从康德到马克思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能够取得科学结果所立足的整合层面。我把韦伯（Max Weber）、米德（Mead）、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帕森斯当作经典理论家，亦即当作对我们还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理论家来加以讨论。和导言以及两卷里的中间考察一样，插入在各个章节中的附论所探讨的也都是整个理论体系内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用法治化对所提出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使命加以阐明。

这样一种研究就这么理直气壮地使用交往理性概念，现在遭到了怀疑，认为它会落入基要主义原理的圈套。但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原理和古典先验哲学混为一谈，这条路是错误的。读者对这一点如果觉得迷惑不清的话，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最后一节。²如果我们尚未找到理性在符号结构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哪怕是片段的和散乱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解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³

当代的历史主题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西方理性主义遗产再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了。在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内在关系（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是联邦德国），越来越要求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付出额外代价；超级大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暂时有所缓和，但从未彻底根除；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从理论上对这些社会现象加以探讨，这样做实际上才是真正掌握了西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精髓。

新保守主义者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他们十分看重由于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而造就的经济增长，而全然不顾这种增长已经日趋紧缩。针对这种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分崩离析的后果，他们想从虽然已经没有什么社会基础但在修辞上仍然还有吸引力的比德迈尔派（biedermeierlich）文化传统那里找出路。很难理解，19世纪后期从市场转移到国家身上——这样做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的问题如果掉过头来，也就是说，如果把问题在权力和金钱这两种媒介之间变来变去，究竟还能产生怎样的新的动力。试图用一种历史启蒙意识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消耗得干干净净的传统资源重新焕发出来，这样做显得更是无力。新保守主义的卫道士们，面对偶尔出现的反现代增长的批判，是寸步不让的。这种批判矛头所指的是高度复杂的经济行为系统和行政行为系统以及已经自成系统的军备竞赛。一边想从传统主义的角度，阻止和削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经验在另一边所导致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立场。这种对立的立场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消除差异，可是，这样反过来又会使自己丧失掉关键的不同特征。限制金融—行政复合机制的增长，和放弃现代生活方式决不是一回事。尽管已经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一种理性潜能，但不能说在于系统复杂性的增长。

上述说明所涉及的当然只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背景，⁴而不是本书的真正主题。本书是为那些对社会理论基础颇有专业兴趣的读者撰写的。没有德文译本的英文文献，我将直接引用原文。法文引文由马克斯·洛泽尔（Max Looser）负责译成德文，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我首先要向英格·佩特兰（Inge Pethran）表示谢意，她把我不

同时期的手稿整理了出来，还编撰了参考文献；而这些只是我们十年来密切合作的一部分，她的合作对我至关重要。此外，我还要感谢帮助查找资料的黑林（Ursula Hering），以及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赫博特（Friedhelm Herborth）。

另外，本书的底稿是我在法兰克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稿。我要感谢学生们的踊跃参与和积极讨论，感谢这些学校的同仁，特别是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狄克·伯恩斯坦（Dick Bernstein）以及约翰·塞尔（John Searle）。

我希望我的叙述能带有充分讨论的性质在里头，果真如此，它们也不过是我们在施塔恩贝格研究所工作过程中争论氛围的折射。我们每周四举办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曼弗雷德·奥韦特（Manfred Auwärter）、沃尔夫冈·邦斯（Wolfgang Bonss）、赖纳·丢伯特（Rainer Döbert）、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君特·弗兰肯贝格（Günter Frankenberg）、基伊（Edit Kirsch）、莫尔施舍尔（Sigrid Meuschel）、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努纳-温克勒（Gertrud Nunner-Winkler）、乌尔里希·勒德尔（Ulrich Rödel）以及恩斯特·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他们围绕本书手稿展开的讨论对我启发颇大；此外，我要感谢图根哈特所做的大量注释。和同事们的交谈，对我也很有教益，比如到我们研究所作长期访问的阿纳森（Johann Paul Arnasson）、本哈比（Sheila Benhabib）、马克·古尔德（Mark Gould）以及麦卡锡，还有经常来研究所访问的西科莱尔（Aaron Cicourel）、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劳伦斯·科尔贝格（Lawrence Kohlberg）、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乌尔里希·厄费尔曼（Ulrich Oevermann）、